



87'3

丛刊

中國
現代文學研究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3

1987



作家出版社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曹全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七年 第三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燕华营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0 字数：250 千

1987 年 8 月第 1 版 198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700 册

北京市期刊登记号：1396 定价：2.05 元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丛刊

1987年第3期(总第32期)

目 录

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

- 继续加强对抗战文艺运动的研究 荒 煤 (1)
关于抗战文学的思考 田仲济 (6)
抗战时期暨建国前喜剧创作论略 赵建勋 (12)
东南地区的抗战文艺 汪毅夫 (28)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发表四十五周年

- 苏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文学概况 严 锋 (38)
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文学运动
——中国工农兵文学运动史提纲 刘增杰 (60)

· 文学史研究 ·

- 略谈鸦片战争以来文学史分期的几个问题 马良春 (74)
现代文学与文学现代化 许志英 (88)
关于编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通信 范伯群 (107)

主体·变动·多样·世界眼光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思考……杨洪承（114）

·作家作品研究·

现代性与传统性的交战

——论老舍对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批判……吴小美
魏韶华（130）

“五四”个性解放文学的历史特征……倪婷婷（148）
论弗洛伊德的变态心理学说对

前期创造社的影响……季进（168）

农民文化的时代选择

——赵树理创作价值新论……席扬（184）

·国外现代文学研究·

《红楼梦》对中国现代文学之影响…〔新加坡〕王润华
刘宝珍（200）

·述评·

一九八六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刘纳（210）

·争鸣园地·

再谈闻一多早期唯美主义……刘钦伟（235）

·书评·

郭沫若史剧研究的丰硕成果

——评《郭沫若史剧论》……箭鸣（244）

人的重新发现

——读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一书……………艾晓明 (251)

一部具有历史感的诗人论

——评陆耀东的《二十世纪中国各派诗人论》……………田本相 (258)

巴金研究的新收获

——评陈思和、李辉的《巴金论稿》……………陈鸣树 (261)

《论曹禺的戏剧创作》读后……………刘珏 (268)

· 旧 文 录 载 ·

四十头牛的惨剧……………蔡希陶 (276)

蔡希陶小说琐谈……………杨占升 (274)

· 资 料 ·

1987年1~3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 (284)

· 论 文 摘 编 ·

《新青年》再评价 (王京生, 291) 冯至散文六十年论 (周棉, 292) 新的艺术思维结构与中国新文学 (冯晓, 294) 观念更新话分期 (陈学超, 295) 鲁迅前期小说对于人民间关系异化的深刻揭示 (伊凡, 296) 钱钟书长篇小说《围城》浅论 (石杰, 298) 田汉早期文艺思想初探 (谭桂林, 299) 一个真诚跋涉者的探求和思索 (李少群, 301) 鲁迅思想的特征 ([美] 林毓生, 303)

夏含德重印

(105) 陈克文 · 动态 ·

新人出版社

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始末 (锡佩, 305) 巴人 学术讨论会在
宁波举办 (微, 312) 《鲁迅研究动态》公开发行 (王世家, 11)

(105) 陈克文 《鲁迅研究动态》公开发行

(305) 王世家 · 新书林 ·

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传 (丛, 167) 中国五四文学史 (葺, 183)

编后记 (313)

(313) 丛 浙江文艺出版社

· 译 ·

(105) 浙江文艺出版社

· 译 ·

(105) 浙江文艺出版社

陈更念 (105, 106) 学文译丛 (105, 106)

陈更念 (105, 106) 学文译丛 (105, 106)

(105, 106) 学文译丛 (105, 106)

(105, 106) 学文译丛 (105, 106)

(105, 106) 学文译丛 (105, 106)

继续加强对抗战文艺运动的研究

荒 煤

今年是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

在八年抗战中，作家投身到这场伟大光荣的战斗中来，或亲赴前线，或深入敌后，或身居大后方，从各方面参加了民族解放与民主运动的斗争，并且写下了各种作品反映了这个时代。就作家活动的广泛，题材的广阔，主题的重大，文学体裁、风格、样式的多样化来讲，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以来、左翼文艺运动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又一个光辉篇章。

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是中国抗战文艺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和新的起点，从而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掀起了一个崭新的文艺运动，促进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加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生活、提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建立起一支新的文学队伍，使得抗战文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因此，我认为，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抗战文学运动，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还没有对抗战文学运动作出更全面、更深入的总体研究，从中作出科学的总结和评价。

从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来看，抗战文学运动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确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是绝对不能否认的。可是，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全面审视、观察抗战时期的文学运动，现实地从我国的创作实践来检阅，又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例如，可以称之为

史诗性的作品，即比较全面深入地从某一个侧面——从某一抗日根据地发展的历史或成长的过程，从零星的游击队建立开始逐渐形成强大的有民主政权的、经济建设和能够进行战役运动战的部队的一个巩固的根据地；或者，从大后方的某一个侧面，抗战爆发，大批军队节节后退，蒋介石反动政权所造成的政治经济的灾难，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更不用说，从全面横向联系，把前后方、敌后和大后方、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相互联系与支持；作为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部——延安这个圣地，它在整个抗战时期的伟大作用和影响……等等，总之，纵观总体，从多方面综合历史的现象，有更高的概括，创造众多生动真实典型形象去反映那么错综复杂的历史真象的史诗性的作品，现在回顾一下，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我个人始终认为，检验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艺运动的成就，最终的也是唯一的标准，还是要看作家与作品，他们是否能够写出比较全面、深入地概括一个时代的特定历史面貌的优秀作品。

因此，研究抗战的文学运动，也只能着重于此，既充分肯定那个时期作家的成就，又应该从今天的历史的角度检阅整个创作的不足与缺陷，探寻原因，作出科学的评价，总结历史的经验，吸取教训。这是当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应该担负起来的历史任务。

就结合阅读现代文学史和这方面的研究文章的感受，我冒昧地提出几个问题供现代文学研究者参考。

首先，应该认真地研究一下为什么一场伟大的抗日战争，给我们留下来的史诗性的作品却不多，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许多有才能又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应有深切感受的作家很快就放弃了或是搁置了这方面的题材？一个很明显也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紧接着爆发了解放战

争。但是，延伸一下来思考，为什么建国三十多年来，也仍然有很多作家不积极去反映这段历史？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据说，写作苏联卫国战争的题材的作家已经出现了第四代，美国当代作家赫尔曼·沃克也先后写了反映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的《战争风云》与《战争与回忆》两部小说。而我们不仅反映抗日战争的巨著较少，反映解放战争的巨著也很少，这是为什么？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能不能从理论上总结这个历史教训呢？

我认为，这是理论工作中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片面强调作家要为政治服务，紧跟时代，迅速反映新的生活，而忽视创作的规律，区别不同的作家有各自熟悉的生活，本来应该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描绘它们；使得一批老作家丧失了自己的优势！至少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们就不会重复过去天真的疑问：为什么我们文坛上不能再出现第二个鲁迅、茅盾、老舍等等。作家终究是时代的产儿，各有历史的局限性。然而，这个局限性，恰恰又是他本人的优势，包含着最熟悉的、感受最深的生活。我现在仍希望并呼吁我们还有些老年作家赶紧把自己经历的革命战争的历史写出来；也迫切希望在各自有丰富革命战争历史地区的中青年作家去挖掘这方面题材。

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极为重要的主要部分就是革命战争史。但也是现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现在提倡反映革命战争历史题材，尤其是要求有更大更高概括能力的史诗性的作品，则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另外，就我看到的某些文章来说，似乎习惯于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评价抗战时期整个文学运动的一个准则。毫无疑问，《讲话》的发表，对抗日根据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文学运动来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些有指导性的根本原则；无论对当时抗日根据地以及后来

解放区的文学运动，都起了伟大的推动作用，对国统区的文学运动的发展也无疑发生巨大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又一次文学革命。然而，这又不能不根据时间、地点、条件加以区别，而笼统地要求国统区的作家都能够深入到工农兵群众斗争中去，与群众相结合，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并以此来衡量与评价作家的作品。对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区的作家来讲，总的奋斗目标和任务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民族解放，并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但是各自生活和斗争的条件不相同，面临的具体任务有所不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所描写的对象不同，因而作家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和区别。

当然从总体来讲，这两个地区作家的战斗任务还是互相联系的。没有抗日前线的文学运动，不能反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侵略军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也不能使世界和全国人民了解这个真相和有利于建立我国人民必胜的信心。那么，我们的文学运动就辜负了时代和人民的期望，没有担负起历史的重任。可是如果没有大后方作家在抗日民主运动中的斗争，不去揭露国民党反动政权倒行逆施与罪恶，鼓舞亿万人民要求民主，坚持抗战，支持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建立新中国的主导力量，那么，整个抗战文学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全面的。更不用说，国统区的文学运动主要也是由我们党所领导的，特别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直接关怀与领导下，以郭沫若、茅盾为首团结了广大进步与民主的作家，尽管受到国民党种种限制和压迫，仍然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的文学运动。正是由于这两个地区、两个战场相互不同、又相互密切联系、相互支持，才形成抗战时期一个全新的民族复兴的革命文学运动。

因此，我觉得对抗战文学运动这段历史还须要作更仔细、更具体的分析，不要把这长达八年特殊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因而对国统区某些作家与作品缺乏历史的科学的评价。例如郭沫若的《屈原》、茅盾的《腐蚀》、《清明前后》、巴金的《火》三部曲和《寒夜》、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老舍的《四世同堂》等这些作品都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绝不能拿它和反映敌后斗争的某些作品作简单的对比，贬低其影响与作用。

总之，对抗战文学运动的研究，我希望还应向纵深发展。就我看到的几本现代文学史来看，基本上是一个框架，在简单地叙述抗战时期的历史背景之后，主要就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作些评价，再一笔带过地提到同时期的若干作家和作品。对这一个时期整个文学运动发展的趋向，错综复杂的现象，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某些作家原来的倾向和风格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国统区与根据地在不同的条件下的创作怎样进行科学的评价，不同地区的文学理论问题又有些什么新的探索，根据地一批文学新军有什么样的特征等等，都还缺乏全面、深刻与细致的分析和评论。更不用说，抗战时期的文学运动从左翼文学运动发展过来，又为新中国文学运动开拓道路，还有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中也有不少经验教训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的。

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对抗战文艺运动还要继续加强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1987年3月初于北京。

关于抗战文学的思考

田 仲 济

一、抗战给了文学些什么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生死存亡的大决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战火的延长，旧日的一切，均改变了。抗战的烈火毁灭了人民，也锻炼了人民，把千万的人民带进饥饿和死亡的灾难中，也锻炼了千万的人民，使他们刚强、勇敢，并且觉醒起来，在敌后建起了大小的抗日根据地。

在一切的变化中，文学和文学工作者是变化最大的。从五四文学革命到一九三七年，这二十年中，“打倒了旧文学”，建立了新文学，文学研究会成立了，创造社成立了，《小说月报》从专刊旧文学改为新文学了，以后不久，《申报》的《自由谈》也改为新文学副刊了。此外还出现了不少新文学的期刊，的确可以说是新文学的巨大胜利和成就。但是考查一下各方面的情况，例如就各种学校的教材说，中学里的语文课，新文学的比重极少，大学中的中国文学史，一般讲到五四文学革命为止，新文学就不讲了，大一国文中的新文学作品更是寥寥无几。就出版和发行说，几乎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新文学的书刊，都创作于上海，出版发行于上海，（有人说，事实也是如此）上海是新文学的市场，即便在其他地区印刷的著作，也必须到上海获得它的“市价”。所以截至抗战爆发，所有新文学作家几乎全集中住在上海。作家，那时一般都是业余的，极少专业的，因为靠稿费难以生活。鲁迅

在上海十年是专以著译为生的，但有一段时间他兼任当时教育部的编审，是每月另有收入的。茅盾也是专业作家，但他兼任杂志编辑的时候较多。就读者来说，新文学的读者是不多的，每种书的印数也很少，一般都是一千册，两千册，甚至五百册，还有少到三百册的。当时我国的人口数说是四万万，可是新文学书籍只能印五百册或竟三百册，这不太可怜了么？有位关心这问题的新文化运动的老人，当时在一篇文章中曾说，旧文学表面上是失败了，实际上宣传封建道德、迷信观念的章回小说、连环图画，还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城市里的小市民、少年儿童，都是他们的读者。它们的发行网是惊人的，出售新文学书籍的，除了上海以外，只有部分的省会，有那么一、二处书店，在各县城里就很难找到了。旧文学就完全不同，它们借传统的旧的普遍存在各县城以至乡镇的笔庄、纸号等一类发行网，甚至可以达到穷乡僻壤。这样，新文学的读者就只有极少数的有进步思想的中学生，不多的，上海一类的大城市的一些店员和工人。这就是新文学革命二十年了，还未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情况。

抗战改变了这种情况，可歌可泣的轰轰烈烈的军民抗战事迹成了文学的主要内容；战事的发展，很快使上海沦为孤岛，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也随着沦陷了。过去集中在上海的新文学作家除了极少数的留在上海外，大部分都分赴各地。有的奔赴抗日根据地，有的回到农村，有的走向抗日前线。都深入了社会，深入了生活，和人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从文学作家的分布，从文学作家和人民的关系，更从文学创作的内容，都可以看出这变化的巨大，可说是根本性的改变。

这种改变影响所至，在部队中，活跃了士兵的文艺生活，可惜在国民党军队中，他们害怕文艺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短暂的一二年过去后，文学工作者和抗战发生后投到部队中的青年学生，就被迫撤离了，有的且遭到迫害。在根据地中，他们的力量使文

学得以繁荣起来，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新的文学工作者。这些新起来的文学工作者，有不少是极有才华，具有特色的，在建国前举行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发到每位代表手中的那套共计一七七篇包括歌剧、话剧、小说、诗歌、报告等的《人民文艺丛书》，作为人民文艺的最初成就，不少就是写于抗战时期的。

二、文艺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后，本拟组织更广泛的，包括各方面作家的团体，虽然曾组成过文艺家协会，但象鲁迅讲的，“还远得很，还没有将一切派别的文艺家都联为一气。”具体地说，文学作家中，鲁迅和一些著名作家就没有加入，旧文学作家一般都没有参加，过去称为民族主义、以后属三民主义以及战国策派那些作家，都没有参加。七七事变以后，几个月的期间，北平沦陷了，上海沦陷了，首都南京也随着沦陷了，国府迁到了武汉市，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住在武汉，体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局面，他个人并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主任。他精心考虑了文艺工作的各个方面，作了组织安排、人事安排和工作安排，他亲自和老舍谈了话，又找人与当时国民政府主管文艺工作的张道藩联系，取得了他的合作，经过了三个月的酝酿筹备，起草了几种文字的草案。象楼适夷起草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冯乃超起草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草案，老舍起草的文协成立宣言……等。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武汉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中提出了响亮的两个口号：“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会议选出了理事会并成立了四个部：总务部、组织部、研究部、出版部。决定出版会报《抗战文艺》，最初是三日刊，以后改为周刊、半月刊、月刊，篇幅也逐渐增多。最重要的是它成了贯彻抗战时期始终的唯一的文艺刊物。文协总会成立

后，短期间内成都、昆明、桂林、宜昌、香港均成立了分会，有的分会也创刊了会报，如成都。

文协各部职责和人事安排是煞费苦心的，文协有理事会，但既没有会长，也没理事长，看起来是奇怪的，事实证明，这种安排是有道理的，是巧妙的。试想，若设会长或理事长的话，人选以谁为适宜呢？当时是以国共为主的统一战线的形势，就参加的作家说，过去曾参加左联的作家占一定的比重，另外在张道藩领导下从南京迁到武汉的中国文艺社所属成员也有一定的数目，但无论从哪一方面找一个会长或理事长都是困难的，既然是统战的局势，那人选就得双方都能接受的，而找一个既有群众威望，又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不设会长或理事长而由总务部主任承担其责任的办法。自然，总务主任既行使会长或理事长的权力，那就总务主任的人选也不易找了。很明显的，倘找过去左联某一成员来担任，人选是不难找到的，但对方是很难接受的。倘若找中国文艺社的人来担任呢？自然，同样的难得另一方的同意的。老舍是接近论语派的，喜欢幽默，他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八年的抗战，老舍坚持团结，坚持抗战，胜利地、圆满地完成了交给他的艰巨的任务，这证明老舍的品德和能力，更证明选人者眼光的正确。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一九四六年五月《抗战文艺》出至第十卷第六期。文协从重庆迁到上海，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抗战文艺》改名为《中国作家》在上海继续出版。事实证明老舍出色地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他坚持了团结，坚持了抗战，坚持了进步。他任劳任怨，始终担负着总务主任的职务。始终坚持了统战的局面，在几次反共高潮中，文协的权力没有被篡夺，文协更没有被解散，《抗战文艺》的内容没有被改变，《抗战文艺》也没有被查封。这些称为抗战时期文艺战线的辉煌胜利并不过份的。

三、文学和人民的结合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不可否认的，欧化的倾向是普遍的，左联时期虽建立了工农文学委员会，在从五四到一九三七的二十年中，虽然讨论了几次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问题，甚至由此而引起中国话拉丁化的提倡，但这一些都未能彻底地解决文学和人民的结合问题。“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也就是“到部队去”，“到农村去”自然文学家就和人民结合了，文学也和人民结合了，文学就成了为人民的了。这使文学创作在抗战初期，通俗文学的形式，成了一时的热潮，出现了许多通俗刊物，如《抗到底》，《大家看》、《大众报》等，都是刊登小调、快板、大鼓、金钱板等一类作品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的提出，不仅击中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要害，更指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方向，因此，民族形式问题引起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文学界的注意和讨论。

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了，这不仅是抗战文学的大事，也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的大事。

在三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期，文学的方向问题已经提出了。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实践上还未能解决这一问题。一九三〇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理论纲领”中，明确规定无产阶级“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一开始就要求“文学为抗战服务”，具体的口号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说明，文学的方向问题，早就在理论上